

《毡乡春秋·拓跋篇》

第一卷 拓跋渊源说疑

——“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唯千万人，虽千百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不必附和雷同也。”

——《习斋先生言行录·学问篇》

篇一 引言

毡乡民族的历史活动——“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①亦如世界其它民族的历史活动一样，不论经行多少世代也不论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19 页。

如何起伏波折，它始终被一条遍及各个实践领域而难于绝断的巨大链条所贯串。这根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可以确信都是由无数颠扑不破的真实所铸成。真实——不论好的、坏的，对的、错的，这就是民族历史实践的本质。自然，它也应当是历史篇章的骨骼。历史实践不可能是由虚伪构成的。然而作为一种反映，它在人们的观念里，却常常以被扭曲的形式出现。在史前时期，随着岁月的消磨，口口相传，传疑传信终于竟被越来越多的以讹传讹相代替。在历史时期，适应某种、更多的是政治需要，在书面上、金石铭刻里，它都不是被如实地、按照它本来的或应当有的样式予以记录，而是听由惯于造作的史官与史匠们移宫换羽，以致失去本色。简直地说，历史真实从其最初起，就不幸被很多史家额外的虚构、伪造所浸染，而后世的秉笔者更从而有意或无意地郢书燕说，层累地增饰，乃至史事变得疑信参半，甚且以伪充真了。这种情况在记述拓跋源及后世的论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宋人王安石《读史》诗所谓“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黜闇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实在不是信口而言的。它甚至使人怀疑就是对《魏书》及其崇尚者而说的。但是，这种经过伪饰的东西，虽然可能富于浪漫色彩或诱人的魅力，因而可能如培根所说给人一种心理上的满足，然而却不是历史生活的再现；不能给人以历史的前鉴。这里不妨从《魏书·序纪》说起。为此，先谈一下人们关于嘎仙洞石刻的论列。

1980年，北国的探索者们因缘际会，偶然而又不偶然地在大兴安岭的一个岩洞——嘎仙洞内壁上，于拂拭尘封及剥洗苔钱中，竟使一处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太武帝拓跋焘的汉字祝文泐刻，一瞬之间复见于天日。千载古迹，一旦发覆，消息传开，自然是各方嘉许。从那以后，诸多书刊相继揭出各家的论证，

以为‘嘎仙洞遗址确为拓跋鲜卑远祖旧墟石室 是无可怀疑的。’^① 它“与《魏书》所描述的基本相符。嘎仙洞一带是鲜卑族祖先活动的地方。石室的发现结束了关于鲜卑旧墟石室所在地的公案。”^② 它“确定无疑地证实了《魏书》所载的真实性。”^③ 它证实了“史称之大鲜卑山，应该是今天的大兴安岭北段；鲜卑民族的发祥之地也应该就在大兴安岭北段。”^④ 它也“证实了大鲜卑山应在鄂伦春自治旗。”证实了拓跋鲜卑的先祖是从大兴安岭东麓越过大兴安岭，经过大兴安岭西麓，进入呼伦贝尔草原的。使《魏书·序纪》所载拓跋鲜卑的迁徙史实，得到了石刻的旁证，并看出这些记载的可靠性。”^⑤ 刻文的发现证实了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祖先居住过的旧居，从而解决了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大鲜卑山’的地理位置问题 证实了森林茂密的大兴安岭 富饶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就是拓跋鲜卑族的摇篮。”^⑥ 甚至认为“嘎仙洞规模之宏大，与《魏书·乌洛侯传》记载相合，完全具备祖庙的神圣威严。”^⑦ 如此等等。总而言之，一，嘎仙洞“确定无疑地”是拓跋人先祖——昌意少子的‘神庙’；二 拓跋人即鲜卑人；三 大兴安岭或它的北段即是“大鲜卑山”；四 这一带“无可怀

① 《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第123页纪游《一个千古求索的重要史迹》。

② 《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年第328页文物处供稿《嘎仙洞鲜卑石室》。

③ 《民族研究》1981年第1期第15页于志耿、张秀仁《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

④ 《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第78页吉发习《嘎仙洞调查补记》。

⑤ 《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第42页。

⑥ 《内蒙古自治区概况》第276页，1983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⑦ 《民族研究》1982年第6期第29页陈连开《鲜卑史研究的一座丰碑》。

疑”地是拓跋鲜卑人的最古源地；五，嘎仙洞刻文证实了魏书的记录。嘎仙洞石刻不误；《魏书》文字也很可靠；六，拓跋人南迁，即从此出发。这就是各文论证嘎仙洞刻文并因此而究及拓跋人源地的异口同声、彼此呼应而又相得益彰的结论。类此詹詹者，如果不限篇幅，本来还可以信手罗列一些。

我历来的印象是：所谓拓跋人族属鲜卑；起始于大兴安岭地区；并从此而南移云云，这种依违《魏书》而发挥的设想，在中外史学界似乎已经因循很久、流行很广，并习惯地在轻信者中成为定论。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声音之在一些人中其实也并没有完全绝响，接口而诵之的，也还不曾少见。当然，通行的说法不必都误，但说都对，怕也未必。嘎仙洞刻文的复现，具有珍贵的文物意义，而就历史资料这点说，它也应当引起人们的注视。因为它不光没有能够否定自来的成见，反而被视为给那些见识（如以上所引名家的话）提供了一种文物的证据。它是“丰碑”，我的兴趣也恰恰是因它而生发的。

我不反对，不，勿宁说，我赞称任何有关石刻、首先是嘎仙洞刻石并由此而引发拓跋史事的论列与推衍的尝试——即使是旧调新翻或新腔旧唱。我甚至愿以高度尊敬，评价诸如以上各论的直率与明鉴。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研究任何事时，都要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①中国的古话也讲“揆端推类 原始要终”。事物渊源的探究，的确必不可少。世界上没有无起源的事物，事物的起源也无不有其所以起源的客观前提。不究明这个起源及其前提，而要发现并把捉它的特定发展过程与必然结果，其可能的困难是可以不言而喻的。从史学与考古的角度客观地评价例如嘎仙洞刻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400 页。

并因此而连类究及拓跋人的族类渊源，探赜索隐，凿凿有据，从而使这个民族的早期史事尽可能在迷茫中较切近地还原于真实；使史书徒然加在它身上的各种伪饰得以一层层地剔除；使历来因仍以倡的成见借以逐次澄清；使拓跋历史规律的探索得以有个较可靠的基石；当然也使这块刻文的本来旨趣有幸能够稍稍被揭示，都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从任何学术意义上说，都是值得的。哥德说过：“历史家的任务在于区别真实的和虚伪的；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以及可疑的和不能接受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当然并不只是这个，但是至少在基本上，科学的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不就应当这样吗？

在历史上，北边诸族的兴替中，拓跋人较之它的先代，或者曾经显现出异样的形影。起先，它无非是一个幽居僻地的蕞尔小族，难称轻重，而后则不堪险涩，终于隐鳞自谋了。它陡然间步履前代的后尘，把自己的眼光转向南天。几经长途跋涉，图谋易地殖民。风云际会，因应变化，耗岁费月，意外地竟被成就为顾盼自雄，称“代”称“魏”的一方强国。“西吞河右，东举龙碣，总括戎荒，地兼万里。虽裂土分区不及魏晋，而华氓戎落，众力兼倍。”^①能“地兼万里”“众力兼倍”这就足够使它雄张一时了。终魏之世，它南与“岛夷”划江峙立；北向“旌头”越塞穷兵。金戈铁马，折冲尊俎，横行半个禹域，鼎祚竟至一个半世纪之久，其造就一方一代的功烈，不能谓之微不足道。就是在它的盛乐时代，至少在当地也做了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不少业绩。但其残破与影响于周边各族者亦不能不谓之至深且巨，而周边各国之作用和浸蚀于它的效应又岂可以浅鲜视之？正是拓跋人开创了“夷狄”而“夏”、以“夷”制“夏”的先例；也正是拓跋统治者衅动起南北

^① 《宋书·索虏传》卷 95。

对峙而又以北攻北（柔然）的史例。当然，也正是拓跋人自己开了北族自毁其族，自毁其国的先河。拓跋人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祸乱北国的历史。清人张之洞有《哀六朝》诗：“神州陆沉六朝始，疆域碎裂羌戎骄。”神州“碎裂”，桓温曾经呵责清谈诸人，说“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能不任其责。”^①其实，就根本而言，“五胡”之余，拓跋进兵，尤为“羌戎骄”之最。然而“陆沉”的又岂止神州，因此，探讨四至六世纪中国北方各族的悲欢离合，实在不能无视拓跋，而考察这一时期的毡乡（包括盛乐地区）兴衰、部落进退、制度变迁以及风情趋向等等，亦不能置拓跋于不顾。然而拓跋云云，究竟是谁，是何族属，祖居何地，世系真伪，因何而迁，路经何所？《魏书》所述何所凭据，如此等等，至今都还不能谓之已经详载史册，而诸家论证已足成圭臬，因而可以放心地说一声“结案”就能够解决的史学问题。至于洞刻本身的稽核，也还未便可以断言真理已被说尽，余子无庸置喙了。

探讨一个民族例如拓跋族的原始，最可靠、最直接、最简易的依据，当然是本族人的记录——依据当时、当地、当事人的真实记录以及他们的实物遗存，然而正是在这里，事情不尽如意。关键是拓跋人没有自己可称为历史的著录，至少没有尚存的文字记录。

就总体而言，拓跋人似乎浑然是一个自满于文盲的民族。它的始初固然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即使它在别人的土地上称“代”建“魏”之后，它也没有利用已有的权力优势与可能条件，设法创制自己可能足以反映固有语言的文字，并且也不见它的各届朝廷曾经表示过这种制作的丝毫意向。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曾经在他即位之初，诏旨“初造新字”，以使汉字“永为楷式”而令

① 《晋书·桓温传》卷 98。

“文体错谬”得以纠正，然而即使他，也还没有像后世的契丹、女真及蒙古统治者那样，想到他本族的文字制定。因此，尽管拓跋人的脚步曾经震撼着大地；它的声音曾为四方所惊愕；尽管它开创了敢于睥睨世界的霸业；经历了从小到大、自北而南；转弱为强、由逆而顺的久远过程；品尝过内外交困的熬煎，并在所有这些实践斗争中也迸发过它的智慧与才能，而适应客观历史的需要，以如实地用自己民族的文字记录其先世阅历及总括这些可以称作烈烈功业的典籍，却无一册遗世。勿庸违言，北魏作为一个中国的朝代，它的开国之主——拓跋珪出于网罗汉族“士人”及汉化自己的目的，曾经诏令广收汉文经籍典册，然而却不见有过征集拓跋耆献掌故的片纸敕令。在他们的建业之初，也确曾应朝士的请求，有过史官的设置，却不见有拓跋人充数其间；他们也曾徒托空言“修国史”，却不见有什么成就，而且随着时间的递变，特别是自代（今山西省大同地区）迁洛（阳）之后，这种应景的虚设，已经愈趋沦落。高祖元宏被誉为“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之主^①。然而他如何“日若稽古”，并无下文。实际景况据高崇说是“秘书图籍所在……？素委积盖有年载。出内繁芜多致零落。”^②“白衣修史”的李彪更指出：“史官叙录未充其盛。加以东观中圯，册勋有阙，美随日落，善因月稀。”^③可以说一片荒凉。堪以提及的倒是私人间，每有踏袭前代修史遗风者。世宗（元恪）时（490—515），李彪曾经报道著作郎渔阳傅毗、北平阳尼、河间邢产、广平宋弁、昌黎韩显宗等，并有记述，然而都“弗终茂绩”。李彪自己虽有“并取前书，撰为国书”的谋算，

① 《魏书·儒林传》卷 84。

② 《魏书·高崇传》卷 77。

③ 《魏书·李彪传》卷 62。

但是到底“载笔遂寝，简牋弗张。”^① 可谓一事无成。其实这已是元魏岁月的末造了。前此，可能涉及拓跋初时史事的著录，北地人梁祚有《国统》、《代都赋》安定邓渊有《国记》（亦作《代记》）；清河崔浩有《国书》并“立石铭刊，显在衢路”。梁祚《国统》不知所云。而邓“渊造十余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② 即使如此，其书所述也只限“代”时，而着重的是太祖纪。^③“逮于太宗，废而不述。”^④ 崔浩所撰也不过“编年序录，为《春秋》之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⑤ 即使“尽述国事、备而不典，”^⑥ 且亦重在太宗、世祖朝事^⑦ 其于前此时期史事，则难说有一字之及。山东人崔光在太和初，也曾“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阙略尤多。每云此史会非我世所成。但须记录时事，以待后人。”^⑧ 其子崔鸿撰《十六国春秋》百卷，但是，“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⑨ 据此，则崔氏父子所述，也还是未及拓跋祖先之事。不光如此，更须着重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撰史者，没有一个是拓跋人；其书也没有一卷是以拓跋文字写缮的。当然不能抹煞他们的一笔之劳，然而《春秋》之笔、夷夏之辨的修史传统，不能不使他们在史事取舍、文字措词上，难免成见或偏见循事。公元 450 年崔浩的“国史”惨案，无论后世文人如何猜测或评证，而其中民族成见应当是有以引发的可能原

① 《魏书·李彪传》卷 62。

② 《魏书·邓渊传》卷 24。

③ 《魏书·高允传》卷 48。

④ 《魏书·崔浩传》卷 35。

⑤ 《魏书·李彪传》卷 62。

⑥ 《魏书·崔浩传》卷 35。

⑦ 《魏书·高允传》卷 48。

⑧ 《魏书·崔光传》卷 67。

⑨ 《魏书·崔光传》卷 67。

因之一。从那以后，不特私家无人敢伏案做文，即国家而言，“史官遂废”。直到公元 460 年，始复置史职，但是一无所成。

一个民族、一个自有历史实践的民族，不自操史觚，不自撰其史，对于自家身世渊源，不明所以；对于本族文化传统，弃之唯恐不及。累世昏昏，并以此而昏昏其后人，此无以名之，直可谓之自毁其史，而毁史则是所以毁族的初阶。自毁其族！这是比自毁其国尤为不肖的。这种状况却长时不见有人起来自谋所以改变的迹象。到肃宗时（公元 516—528），拓跋人随着其族势国运衰微、文史跌宕，似乎一觉醒来，开始感悟到史的重要及本族人自修族史的必要。山伟就向身膺上党王的元天穆及仆射尔朱世隆陈述：“国书正应代人修辑，不宜委之余人。”^①这里的所谓“代人”乃指拓跋人；所谓“余人”即指非拓跋人。他的意思明白得很，拓跋史应由拓跋人自修。他为什么忽发此想，夫子不曾自道。后人无从得悉，魏收说他是在“谄”上党王及尔朱世隆。“谄”不必绝无，而“余人”修史之民族偏见或亦使然。但是，他的呼吁不过是一挝暮鼓而已。当时的北魏已经日薄西山，在位的肃宗不过是十八岁的娃娃，专权的灵太后是安定汉人，‘虽不必庸愚，然正秽乱中宫，废弛朝政，而各地的反抗义旗却波翻浪涌，戟指目怒。在北魏统治者已经如此俛焉如不终日的时候，谁还有兴致追思远祖故事，以振刷民族而治史图新？所以山伟等虽然妄想以此自励，终究得不到朝廷的支持，以致只能“守旧而已，初无著述，故自崔鸿之后，迄终伟身，二十许载（公元 516—534）时事荡然，万不记一”终于招致“后人执笔，无所凭据。”^②魏收说“史之遗阙，

① 《魏书·山伟传》卷 81。

② 《魏书·山伟传》卷 81。

伟之由也。”^①这是魏收的私嫉。其后至出帝时，拓跋人刘仁之任著作郎，也“在史未尝执笔，”^②足见诿过山伟是不足信的。“无所凭据”，这话至为重要。继魏而起的北齐之初，元晖业（魏景穆帝玄孙）曾撰《辨宗录》四十卷，然只限“魏藩王家世”^③并不涉及族的祖先源流。这样，拓跋人自著拓跋史而不是北魏史；自述本族源流而不是代、魏始末，终无所成。它对于诸如上面提出的问题，到底无从正面回答。

魏收并不是拓跋人，其所撰《魏书》当然不是一无所据，然而根本地说，它特别是北魏一朝兼及四外诸族之史，其中虽不免多涉拓跋诸事，终不便迳直视作拓跋全史，特别是不能视作先魏时期的拓跋源流史。魏人修史的状况既然如此，那么，魏收驱笔竟敢铺张拓跋力微以前的史事，到底出于何经？据于何典？这是涉及到史料的问题，实在不能轻忽。

史料的搜辑，史料的考证，史料的使用以及治史方法，历来是任何史学工作者都必然经历的。对于《魏书》，尤其是其涉及拓跋渊源的记述部分，更不能文崇字信；不能唯魏收的马首是瞻。有道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啊！不尽信，这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原因就在史料的缺乏；就在除《魏书》之外，更无多少直接的资料可以参证；就在多年来形成的被奉为圭臬的权威的影响。跳脱窠臼，摆落脂腻，历来叹难。难字当头，遂转而就易，而陈陈相因，率由旧章的做法，也就“习矣而不察焉”了。韩愈尝慨叹：“唯陈言之务去者，戛戛乎其难哉。”实在也是习也有自啊！然而古人已经说过：“众好之，必察也；众恶之，必察也。”这虽说的

① 《魏书·山伟传》卷 81。

② 《魏书·刘仁之传》卷 81。

③ 《北齐书·元晖业传》卷 28。

是人事，却也不妨用于治学。那种“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的办法，是不足以言治拓跋渊源之学的。

我对于毡乡史事，历来怀有兴致。毛泽东同志批评的那样“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的倾向，自信还算没有。拓跋人出身毡乡，源于幽都，自然也无须排遗在我的这种兴致之外。但是，我对它的形象及渊源，起先并没有意识到多少重要，因此也就不曾做过精深的考究，即使间或见到有关它的参考资料（不论书面或刻石），也往往只是涉猎书记，过目而忘。至于据此而运笔，则更非所拟了。今天，我之所以终于冒昧尝试这篇东西的撰写，奢望于薄雾轻云中，能多少究明拓跋渊源，以见毡乡历史趋势的近真规律，只是因人们的论证并受到激动而即兴引发的。我的见解是否如愿，当然未敢自诩。但是，我应当在这里特别地感谢前此论证诸家，为我的笔耕提供了一个契机。

一般说，前人的著述（包括《魏书》）并不都是率尔操觚。他们的辛劳为后人因枝而振叶，沿波而讨源，缔肇了方便。它们得到后人的重用，理亦固然。但是，那些典籍是在特定历史局限中撰定的，史家用以体现他们世界观和实现当时的企望的成品，绝非天衣无缝，无懈可击。恰恰相反，其中至少是瑕瑜互见，甚之者往往是完全不足恃的，对此，必须清醒。清人钱大昕曾经说过：“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非为齟齬前人，实以开导后学。”^①在这里，这位一代汉学大师是主张对旧史陈论祛疑指瑕，进行“考异”的。他的这种治史精神，不值得恭维吗？我的考察当然无足以侈言“开导后学”，充其量不过是破除迷信，不俯仰于人并向历来汇成的死水中投一块小石而使其出现一圈微波而已。

^① 《二十二史考异·序》。

我在这里于行文中，颇多征引。这虽或不免显得冗繁，但是希望不以骈枝视之，一则借此以见我的论列并非徒托空言，也并非都是一己的陋见；二则为别人更作深的寻绎，再提供若于资料；三则借此以示不没前人的功力。北齐颜子推说过：“用其言，弃其身，古人所耻。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窃人之美，神鬼之所责。”^① 我的征引，意亦正同。

问题是从嘎仙洞的刻石掀起的，以下就不妨先谈刻石。

篇二 “ 所当防其流弊 ”

刻石纪事，由来已久，宋人郑樵说：“三代而上，唯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唯用石刻。”^② 夏商周前不止勒用“鼎彝”，石刻也不必始于秦季。

《墨子》已有“镂于金石”的说法。宋人欧阳修《集古录》目录所载刻石即自周人为始。《事祖广记》甚至以之追溯到“无怀氏”。这当然不必信实，然考证岩画所示，刻石以记，确很邈远。东汉以后，刻石逐渐趋滥，演至北魏，允为高潮。古人之所以利用坚石纪事造像，其意只是为了它的不易毁坏，难于移动，坚实耐久，足可垂远的功能。而且较之金属，更易取材、更易入手、更少耗费、更易普及。魏人祭天而刊祝文于岩嵌，其用意亦不外此途。

刻石的功用，非止一端。书法、工艺自然是它的价值所寄。所谓“观晋人书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

^① 《颜氏家训·慕贤》卷 2。

^② 《通志·金石略·序》卷 1。

则。”这是一般排印读物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石刻文字之尤称珍贵者，乃在它的记事表象功能。事实上，原其始初，刻石者的用意当亦不在宣示书法、夸耀文藻，尤其也不在表白工匠的刀法技艺，实在无非是石碑、石碣、石鼓、岩崖的经久、高大以记当时人事而昭远久而已。清人章学诚所谓“千百年后，按覆前代记载，校其遗阙、洞如发覆，则古人作为文字，托之器物，以自寿于天地之间 其旨良深远矣。”未始没有道出了前人刻石的初衷。这话无疑也适用于嘎仙洞石刻。

当作历史资料看，刻石的文献价值的确不容轻视。历来究心历史地理者，无不重视这个。魏人酈道元注《水经》，多录汉晋以下可见的碑版。就是魏收其人，在他的《魏书 地理志》中，也每有碑刻入录。原其初意，无非藉它以稽古事。李唐以后，刻石更成一学。而至宋代，尤称鼎盛，集碑考石者时多辑录。步入清代，碑帖依然大兴。乾隆时考据之学加盛，于是石刻之类被视为证经考史的津梁，留心石刻者日多，而碑碣之出世者亦相继于各地，集碑之书更不乏见。随着西北及蒙古史地的被重视，那里的刻石也迭有发现并被赋予高度评价，罗振玉以为“古刻之裨益史

其有助于考史最宏。何则？边裔之事，关于我族与他族交涉者甚巨，然而旧史语焉不详，非借助石刻，而此种史料遂湮也。”嘎仙洞刻石显耀在“边疆”、“四裔”地区，其引起人们的注意，应当绝非偶然。

蒙古地方自古族类繁兴。匈奴以降，民族文字亦多有通行，然

《通志 金石略 序》卷 1。

② 《章氏遗书外编》卷 15 《永清文徵》 3。

③ 《西邨石刻录·序》。

④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 4

记录石刻并裒为专辑则曾不一见。唯据汉文载录，则蒙古地方刻石，不仅所在多有，甚且可以上溯很古。酈道元说：黄河东北有石崖山，“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董祐诚以为这个“画石山”“当即今阿尔布斯诸山，在鄂尔多斯右翼中旗（即鄂托克）界中。”同时，临河县阳山之南有“石迹阜”，酈道元注说“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马之迹，故纳斯称焉。”据董祐诚说，此处“石迹”地在今乌拉特旗西境大河之东。^①这里说的是“自然有文”、“破石之文”不是人刻手画。但是，这些山崖也有人的“刻画”。这些“刻画”究竟始于何时，无从参证。或以为乃匈奴人所刻画，它们是匈奴文化的反映云云，这自然可以自备一说，但是似欠的据。按石迹阜在阳山南，为北假中，那里向为“冠裳之国”与“引弓之国”的分界，也历来是双方交争或进出之地。赵武灵王的长城戍守就立在那里；秦蒙恬将数十万人击胡，斫山筑障、据阳山北假中为戍。箭拔弩张，虎视眈眈。匈奴乃“行国”，亦战亦牧。筚路蓝缕于戎马倥偬中，悠然刻石在战场险地，伫足自娱，殊难想象，且所描图象绝不类如战争杀伐，多属静态描刻，不具社会气息。画石山更在黄河以南套内，匈奴河南王虽也一度在此住居，然此地乃秦北地郡。秦人居处屯垦以为常业，不得视为匈奴一族故居，所以在这种地区恣意刻画，甚少可能，且当时匈奴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已远远超过刻画时代，而岩刻所示却在技术上尚落后在很低的水平上。我很遗憾的是没有能亲自到“岩画”现场去看手摸，但却有幸看过有关的照片或影印。据我的初步印象：凡刻画者大都在砂质岩崖之上，无一定形象，当是随石纹走向所描刻，就某些形象看，不免使人想起鉴定地层时代的诸种生物化石如菊石、白羊石等，而

① 《水经注》卷 3。

伊克昭盟地区据说确曾是一片汪洋海泽之地，所谓画中有入面之类云云，大概多半是后世的考察者们依形而作出的主观臆测；至于绘画者，则多在青石上，且每有人物等形象，这显然是后世好事者们偶然的即兴之作，绝非先古之迹。当然，如果一定要疑古，则我反而以为其中生物、用具之类，则倒反而是汉人象形文字的萌芽或雏形，实在与匈奴无关。汉字之初，不就是始于刻契、昉于图画吗？所以我倒倾向于这种设想：“岩画”的价值不在匈奴文化的反映，而在提供了汉字始原的佐证。在时间上说，恐怕远在传说时代了，但是，考虑到刻石需要有更坚硬的器具，升空而绘也还需要攀缘技术，刻绘所达到的不同水平，而又没有统一的布局，则划痕当非一代、一族，也非什么寓意之作，不过就“自然有文”摹划而已。但是，不论如何，蒙古地方的山崖之有欧洲人所谓的那种“岩画”，总可以视为刻石造象的萌芽。

据《穆天子传》，周的穆王“西征”，自漳水南岸起行，沿今京广铁路这一线北上，出雁门关又沿今京包铁路这一线西行，至河套燕然之山，继而至甘肃而新疆，然后沿天山以南一线，从原路经河套而回洛阳。在途中，他“驱升于弇山，乃纪丌于弇山之后。”^①又“观于春山之上，乃为铭迹于悬圃之上，以诒后世。”^②这里的所谓“纪迹于石”、“铭题于悬圃”，郭璞注谓“铭题、勒石铭功德也。”丌亦为一种记号。弇山郭注为弇兹山，“日所入也”。《山海经》则迳写作崦嵫山；“崦嵫”与“焉支”音近。崦嵫山即焉支山的异称，史家以为地在乌拉山巅，遵此，则在阴山的西端。“春山”或作钟山。“春”与葱声同，郭注以为“唯天下之高山也”。因而有人以为春山即葱岭。这是可备一说的，但是不无

① 《穆天子传》卷3。

② 《穆天子传》卷2。

疑窦。葱岭远在万里之西，昆仑尚在它的东面。春山首见于同书卷一，穆王尚在西征的起始途中，如何能遽至如此远地？且春山与“河宗（内蒙古清河县一带）”“河伯（黄河之神，在洛连书，指为葱岭，远离“河宗”，更嫌不类。葱、春字属钟韵，同韵的尚有丰、公、翁等，假如拟春山为翁山亦似无不可。翁山即翁衮山，为阴山一脉。阴山曾被喻为匈奴苑囿，而葱（春）山也“清水出泉，温和无风，飞鸟百兽之所饮食，先王所谓悬圃。”^①二者亦或一致。据此，则阴山刻石实为蒙古地方刻石之祖。《穆天子传》一书原为西晋太康初魏襄王墓出土之物。人或疑为伪书，然书中所记、特别是由宗周至河宗等途中事，类同起居注，文非凿空。卫聚贤甚至认为其书当是匈奴种鲜虞中山人所著。其说颇多论据，兹不赘引。如此说可信，则祖述蒙古地方最早刻石尚是蒙古先民^②，是亦值得一提。

其后，历经秦、汉、两晋，长城以北刻石状况，一时无考，北魏建国，刻石造象，颇称隆盛。康有为曾以为“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太和以后，碑版尤盛。佳书妙制，率在其时”又说“孝文以前，文学无称，碑版亦不著，仅所要者，唯有三碑。道武时，则有秦从造象、三银堂题名，太武时，则有巩伏龙造象、赵瑯造象，皆新出土者也。”^③很显然，康有为所说，只着眼于书法并且没有包括蒙古地方的魏碑。

随着势力的扩张及对柔然等族战端的挑起与连绵，拓跋人在蒙古地方的石刻，兵锋所至，也每有记录。据《魏书》：公元304年，拓跋猗𡗗（桓帝）与晋州刺史司马腾盟于汾东，乃使辅相卫

① 《穆天子传》卷2。
《古史研究》二辑。
《广艺舟双楫·备魏》。

雄，段繁于参合坡（今内蒙古凉城境）西累石为亭，树碑以记行。公元 391 年（魏登国六年），太祖拓跋珪与刘卫辰战于五原，“于柸阳塞北 树碑记功”。公元 398 年（魏天兴元年）2 月，拓跋珪破高车，还次牛川（今内蒙古武川北）及薄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并刻石记功。公元 431 年（神䴥四年）11 月，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率其部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以赐从者，命邓颖为文，勒石漠南，以记功德。公元 438 年（魏太延四年）拓跋焘三道出击柔然，北向天山、西登白阜，刻石记功。公元 442 年（魏太平真君三年）6 月起殿于阴山之北曰广德，刻石树碑 勒宣时事。碑颂云：‘肃清帝道，振摄四荒，有蛮有戎，自彼氏羌，无思不服 垂泽稽颡 恂恂南秦，欽欽推亡 峨峨广德 奕奕焜煌。’侍中司徒东郡公崔浩之词也，碑阴题宣城公李孝伯、尚书卢遐等从臣姓名。^①公元 443 年（魏太平真君四年）拓跋焘遣李敞等刊祝文于乌洛侯西北石室。公元 458 年（魏太安四年）高宗拓跋浚北征，渡大漠。吐贺真远遁，“乃刊石记功而还”。公元 470 年（魏皇兴四年），显祖拓跋弘三路攻柔然，会于女水之滨，改女水曰武川 遂命高允作《北征颂》（亦作《北伐颂》），刊石记功”。太和中（按：当在太和十八年七月），高祖元宏又在广德殿之东筑讲武台（《高祖纪下》作“阅武台”）台东树有“高祖讲武碑 碑文是中书侍郎高聪之词也。”^②公元 496 年（魏太和二十年）迁南之后，已远离北边，与柔然交兵无多，其留在当地的刻碑亦不见于记录。公元 528 年（魏建义二年）魏帝曾下诏：“蠕蠕主阿那瑰镇卫北藩，遂使阴山息警，弱水无尘，刊迹狼山，铭功瀚海。”^③语气上似乎当时也曾刊碑于阴山一脉。所有这些，当然只是载诸

^② 《水经注》卷 3。

^③ 《魏书·蠕蠕传》卷 103。